

1934年夏周作人郭沫若会面背景考察：以“钱玄同致周作人函”为线索

潘，世圣
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里见，敬
九州大学大学院语言文化研究院

<https://hdl.handle.net/2324/2348786>

出版情報：文化論集. 55, pp.647-663, 2019-09. Waseda Commercial Studies Association School of Commerce Waseda University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1934年夏周作人郭沫若会面背景考察 ——以“钱玄同致周作人函”为线索

潘世圣
中里见敬

论文摘要：本文以“钱玄同致周作人函”为线索，关注以往几乎从未进入“周郭会面”这一事件考察范围的两位日本人士——田中庆太郎与中村不折，详细梳理1934年夏“周郭会面”的历史背景，明确会面过程及周边背景的细节结构，还原1930年代中日文化文学及学术交流交错的丰富情态。

关键词：周作人 郭沫若 文求堂 田中庆太郎 中村不折

1934年7月15日，周作人一行抵达日本神户，开始探亲访友的私人访日行程，同年8月28日一行由东京启程回国，完成历时一个半月的访日活动。由于周作人在中国文学界学术界以及教育界具有重要地位，尽管此次访日系私人行为，但还是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欢迎。访日期间，周作人与已在日本流亡避难近六年之久的郭沫若数次会面，成就了现代中国文化名人间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¹。

本文以“钱玄同致周作人函”²为线索，关注以往几乎从未进入“周郭会面”

1 关于周郭会面，有部分研究著述有所涉及，可资参考。如成家徹郎「郭沫若と文求堂田中慶太郎：交流の軌跡」〈『人文科学』十五，大東文化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0〉、劉岸偉『周作人伝：ある知日派文人の精神史』（ミネルヴァ書房，2011）等。

2 此外，“钱玄同日记”亦为重要资料，含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两种。

这一事件考察范围的两位日本人士——田中庆太郎与中村不折，详细梳理 1934 年夏“周郭会面”的历史背景，明确会面过程及周边背景的细节结构，还原 1930 年代中日文化文学及学术交流交错的丰富情态。

另，本文与中里见敬「濱文庫新収資料「錢玄同致周作人書簡」について：錢玄同、周作人、中村不折の書をめぐる日中文化交流」（『九州大学附属図書館研究開発室年報』2017/2018）及潘世圣、中里见敬《〈春水〉手稿后话及周作人钱玄同俞平伯诗作信札》（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 年第 4 期）等文有若干资料及论述上的重叠，请方家识者谅解。

一、钱玄同与“魏晋大字”及“中村不折笔”

2017 年，已故中国戏剧研究者滨一卫先生遗属向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滨文库捐赠数件文物，其中包括“钱玄同致周作人函”。这一枚同时也是书法作品的书函，系周作人赠予滨一卫（原九州大学教授），赠送时间为 1938 年 8 月。时逢滨一卫 1936 年北京（北平）留学回国后再次访华，并寄宿周作人府上。书函全文如下：

名齋再白專齋。足下用中村氏筆，初始作書，固甚苦艱澁。此信即其鑒證也。但弟敢信，用之純熟以後，必有得心應手之快感，此可斷言者。彼時若偽作漢晉書影，私謂必勝于某君之陶詩卷子也。錢玄同又白。「疑／古」印

这里，钱玄同向周作人讲述自己使用“中村笔”写字之体会，所谓初用不免“甚苦艱澁”，但“用之純熟以後，必有得心應手之快感”。又说“此信即其鑒證也”。此事《钱玄同日记》恰有记载：“1931 年 3 月 2 日”记曰“前托启明购中村不折笔，昨日送来。写魏晋字大佳。”³由此可见，1938 年滨一卫获赠的这则书函，正是钱玄同收到中村笔并试用之后所写的致谢函：第一，感谢周作人代购中村不折笔，

第二，禀告自己用此笔写字的感受，第三，向周作人推荐此笔。关于“中村不折”，稍后会有详细涉及。此处先看中型日语词典《辞林21》（东京：三省堂，1993）“中村不折”条目的注释：生于1866年，卒于1943年，“西洋画画家、书法家。生于江户，本名鉾太郎。曾留学法国，师事劳兰斯（1838-1921）。归国后，成为太平洋画会的代表性画家活跃于画坛。代表作品有《春の渡し》等。另，热衷六朝书道，创建书道博物馆。”

至于钱玄同所说的“中村不折笔”，又称“龙眠笔”。系至今仍在营业的百年老店——“笔匠平安堂”（东京）研制的书法用毛笔。时为1908年，在东京麹町富士见町，文具制造销售商“笔匠平安堂”创始人冈田久次郎，“偶然看到了广告牌上的中村不折题字，不禁怦然心动”。于是便“带着公司研发的毛笔去拜访中村，拜托其试用。试用效果很好，毛笔得到先生的一再赞赏，并得到允诺，可以先生用笔的名义进行销售”，先生还“将为之命名‘龙眠’笔”，公司随即开始销售⁴。

钱玄同专门托周作人购买“中村不折笔”，意味着钱玄同知晓中村不折，也知道以其名冠名的毛笔。钱玄同没有留下更为具体的记录，其中细委不详。但如果充分了解中村不折在日中画坛书坛的地位和影响，这个问题便不难理解。

二、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

另外一个人物，便是田中庆太郎。说到田中庆太郎，有关的中文资料相对多一些，故国内有不少学者曾有论及。资料方面主要有田中的三儿子田中壮吉于1987年编辑出版的一册纪念集，题曰《日中友好的先驱者“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东京：极东物产株式会社）。纪念集以中文形式出版，开篇是田中庆太郎简略年谱及相关照片资料，“评传”部分收录田中生前九位好友的回忆文章，

3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8卷第399页；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中册第791页。

4 见“平安堂的历史”。据「笔匠平安堂」主页。2018年10月6日确认。（<http://www.sho-heiandou.co.jp/history/>）

以及《朝日新闻》的一篇报道，披露了很多具体有益的资料：“书简”部分则以原件照片形式首次披露了“中国著名人士致田中庆太郎”的书简，含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傅抱石等人，纪念集整体具有很高的历史资料价值。该书刊行后，编者曾向中国国内有关机构和学者赠送过数百册，对学界了解考察田中及文求堂与中国的关联，特别是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与文求堂的关系始末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国内有关田中文求堂的既有考察，无论有无说明交代，大体都以该纪念集为主要资料来源⁵。另外一种重要资料，是马良春、伊藤虎丸主编的《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文物出版社，1997）。该书收录郭沫若十年流亡日本时期（1928—1937年）之1931—1937年间致田中庆太郎父子的书简、明信片、出版笔记等，共二百三十函，其中一小部分在前述纪念集中先期披露，书简集经编者花费十年时间整理辨识翻译（日文部分），为学界使用这批资料提供了极大便利。这批书简数量多且保存状态完好，作为极其贵重的第一手资料，对了解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尤其是学术研究著述及出版情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有关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的诸种研究成果所使用的主要资料无不依赖上述两本书。

“文求堂”书店于明治维新前的1861年（文久元年）创立于京都，田中的祖父为第一代店主。店名来自于当时的年号“文久”。“文求”和“文久”日语读音完全相同，但回避了后一个汉字的重叠。1901年（明治34）年，即鲁迅赴东京留日的前一年，“文求堂”由京都迁至东京，成为东京第一家，也是当时最具规模的中国典籍书画专门书店。第三代店主，即与现代中国发生过紧密关系的田中庆太郎生于1880年，比鲁迅和郭沫若分别年长1岁12岁。田中是那个时代少有

5 如：陈福康：《鲁迅与田中庆太郎》（《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7期）、卜庆华：《郭沫若致田中庆太郎的书简及说明》（《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吉少甫：《中国的琉璃厂与日本的文求堂》（《中国出版》1991）、魏奕雄：《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文史知识》1992年第5期）、魏奕雄：《文求堂与中日文化交流》（《文史杂志》1997年第2期）、李俊标：《“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日语知识》2003年第5期）、蔡震：《打开尘封的记忆——郭沫若在日本人际关系述略（之一）》（《郭沫若学刊》2004年第1期）等。

的中文科班出身，他于1899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专门学校（东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中国语学科。次年，第一次赴中国，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游历购书。1908年至1911年，田中庆太郎夫妇留居北京三年，一边研习中国古籍书画知识，一边搜求善本珍籍。1923年东京大地震后，文求堂由过去主要从北京输入古籍珍本，转为从上海购入实用性普及性新刊本，但依然是东京乃至全日本最著名的汉籍书店，为日本中国学研究提供及时有效充足的资料用书，为日本的中国文化教育研究和传播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田中本人则经过长年钻研历练，以书店老板之身兼而成为可以比肩内藤湖南、岛田翰等著名学者的中国古籍版本专家。

文求堂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即它不仅是一个围绕古代汉籍及其他书籍文物运转的一个书籍经营平台，它同时还发挥了另一个或许是更加重要的功能，即汇集联结当时中日学界学人相互交往交流的重要场域。以郭沫若为例，正是通过文求堂，郭沫若得以结识内藤湖南、水野清一、中村不折等名重一时的日本人士，通过这些人际网络获得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如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因为有了文求堂的介绍关照，郭沫若才得以建立与东洋文库的联系；同样因为田中，郭沫若才可能利用到大人物中村不折的私人收藏品及其他资料文献。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的学术研究成为其整个学术生涯的一个高峰，在这一过程中，得力于文求堂甚多。这一点既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也应该给予更高的评估。

田中庆太郎交游广泛，但因其职业特点及个人性情，仍属与中国人士联系最多。董康、傅增湘、张元济、郭沫若、郁达夫等，都与他过往密切。1930年代初，田中开始与鲁迅交往。1932年4月，文求堂编辑出版《鲁迅创作选集》，收录《孔乙己》《药》《阿Q正传》《故乡》四篇小说，编辑与发行人均为田中庆太郎。5月12日，鲁迅收到田中赠书；5月21日《鲁迅日记》记曰：“收文求堂印《鲁迅小说选集》（“小说”系“创作”误记。笔者注）版税日金五十”。鲁迅阅读赠书后发现“颇多讹脱”，便自作正误表寄给文求堂。田中庆太郎迅即印制“鲁迅创作选集正误表”及时寄给鲁迅。6月2日，鲁迅“得文求堂田中庆太郎信”。1935年12月，田中庆太郎女婿增井经夫访问上海，其使命之一便是拜见鲁迅，

转达田中庆太郎的盛意，邀请鲁迅到日本休养。1966年5月22日，日本《朝日新闻》刊载记事《怀念文求堂主人——以逝世十七周年纪念日为契机，荷兰大使在准备》。文中写道：“昭和九年（1934年）末，田中氏派在金泽大学当教授的女婿增井经夫到北京，去邀请文豪鲁迅到日本叶山自己的别墅来疗养。”增井经夫访沪期间的1935年12月14日，鲁迅为其书写条幅：“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⁶而郭沫若，在流亡日本的十年间，与田中交往最为频繁，于艰难岁月中得到过田中庆太郎的很多无私帮助。尤其在后来享誉学界的中国古代文字方面的学术研究、著述和出版上，文求堂居功至伟。以出版而言，从1932年开始到1937年郭沫若秘密归国，除《前秦天道观之进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5）一种之外，郭沫若的学术著作均由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1，手迹影印）、《金文丛考》全四册（1932.8，手迹影印）、《金文余释之余》（1932.11，手迹影印）、《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全四册（1933.5，手迹影印）、《古代铭刻汇考四种》全三册（1933.12，手迹影印）、《古代铭刻汇考续编》（1934.5，手迹影印）、《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全五册（1935.3，手迹影印）、《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全五册（1935.3，1935.8，手迹影印）、《殷契粹编附考释索引》全五册（1937.4，手迹影印）等，对中日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充分显示二者关系的非同寻常。

可以肯定的说，郭沫若与田中的关系远远超越了书店老板与读者作者之间具有商业交易性质的单纯关系，而成为具有情感和伦理性质的患难之交、亲密朋友。正如郭沫若研究者蔡震所言：将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之间关系的方方面面加以梳理之后，我们可以说，“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一关系的内容与实质，那就是‘朋友’。而且那是一种交往非常密切的朋友关系，是两家人之间可以相互登堂入室的朋友关系。这一关系贯穿在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交往的各个方面。”⁷

6 参见唐政：《鲁迅与日本的父子、翁婿、夫妻友人三题》（《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2期）及《日中友好的先驱者“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东京：极东物产株式会社，1987）第40页。

7 蔡震：《打开尘封的记忆——郭沫若在日本人际关系述略（之一）》，《郭沫若学刊》2004年第1期。

三、郭沫若与中村不折

“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交往的初始，是缘于他进行金文甲骨的研究。郭沫若的才气、田中庆太郎的识才，郭沫若沉潜于远古史迹研究的那番执著和毅力、田中庆太郎作为一个经营汉籍兼营出版的商人所独有眼光和魄力，当然是他们逐渐结成朋友关系最基本的动因。所以郭沫若编撰著作的出版事宜，成为他们交往的最主要的方面。但它不是简单的你拿书稿来、我出版的关系。郭沫若在编撰书稿的过程中就不断得到田中庆太郎的帮助和支持。这些帮助和支持包括：参考书、工具书的借阅、提供、购置。拓片、图片的摄制、翻拍，资料的查找、核对、抄录等等。在书简中，关于书籍版式、开本、用纸的考虑。图片、图版尺寸大小的商定等等内容也是很多的。”⁸ 在这个过程中，得益于田中，郭沫若结识了著名画家、书法家、书法美术艺术品收藏家中村不折，并获得诸多帮助支持。

日本学者曾关注过这一点，松宫贵之在其论文中写道：“从文库目录来看，当时郭沫若的藏书中有许多中村不折著述或编纂的法帖类书籍，使得身在市川的郭沫若可以学习丰富多彩的古典书法，而这些都反映在他那一时期的作品中。另外，在致力于古文字研究的过程中，郭沫若也利用了中村不折收藏的甲骨文。这些都反映在他的致谢信中，证明了郭沫若和中村不折之间的奇缘。”⁹

对《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进行统计后发现，在这些信中，共有十七处提及中村不折。诸如，通过田中的介绍，郭沫若从中村那里借用资料，然后去信致谢；或者是郭沫若拜托田中将文求堂出版的自己的著作赠送给不折先生，等等¹⁰。具

8 蔡震：《打开尘封的记忆——郭沫若在日本人际关系述略（之一）》，《郭沫若学刊》2004年第1期。

9 松宫贵之「民国抗日战争期に於ける郭沫若の「書」及び「文学」の論理」（『郭沫若研究会報』第15号，2016）。文中所说“文库”，系指位于日本东京都三鹰市新川5丁目14番16号的“亚非文化发展财团”所管理的“郭沫若文库”。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1928—1937）从事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使用的参考资料均保存于此，其中包括藏书1340种，以及一些文房四宝收藏品。

10 见马良春、伊藤虎丸主编《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提及中村不折的书简编号为：29、37、41、43、64、68、72、83、105、109、126、130、131、172、173、193、227。这些书简的写作时间由1932年8月17日到1937年6月2日。

体如下：

(1) 第29函(1932.8.17)：关于《卜辞通纂》编著出版，“河井仙郎”“中村不折”之“未曾著录藏品拟一并载入，请老兄与两位洽商，或与老兄同道奉访相求。”

(2) 第37函(1932.10.11)：“中邨不折氏藏甲骨照片，请寄来。笔懒，尚未奉函致谢，请示住址。”

(3) 第41函(1932.10.19)：“不折先生处已奉函致谢。”

(4) 第43函(1932.10.24)：“中邨先生手拓卜辞数纸拜领。惜最新最大者系赝品。”

(5) 第64函(1933.1.10)：“拓片大小二十八纸妥收。”“不折氏所藏部分内容平平，无须摄影。用时，复制《书道全集》足矣。”

(6) 第68函(1933.1.23)：“中村氏兽骨释文一纸，祈转交为荷。”

(7) 第72函(1933.2.5)：“不折翁甲骨照片奉到（博物馆一份亦收到）其中二、三片全然不可辨识，实无计可施。如能向不折翁求得拓片固佳，否则拟割爱。”

(8) 第83函(1933.3.31)：托田中将出版之《卜辞通纂》寄赠中村不折。

(9) 第105函(1933.12.8)：托田中次子震二将《古代铭刻》寄赠中村不折。

(10) 109函(1933.12.21)：“中村先生之《十七帖》昨亦奉到，系先生惠赠，祈代致谢意。”

(11) 第126函(1934.4.7)：“惠书奉悉，承寄诸件均已拜领。中村先生处祈代致谢意。”

(12) 第130函(1934.4.28)：“若中村氏所藏亦有刻辞，则以拓片或照片一并插入拙著《续编》卷首文中，仅就增添资料而言亦有意义”。

(13) 第131函(1934.5.5)：“不折翁拓器奉到，多谢，并祈代为致谢。”

(14) 第172函(1934.12.27)：“蒙转致不折翁《写生贴》及《楚词概论》，均已领讫。不折翁处已另函鸣谢，乞释厘念。”

(15) 第 173 函(无日期, 似近第 173 函): 托寄赠《续编》于中村不折。

(16) 第 193 函(1935.8.21):《图录》“中村、古城二翁处已由此间直接寄, 请勿另。”

(17) 第 227 函(1937.6.2): 关于《粹编》一书, “如有余书, 中村不折、河井仙郎、张丹翁、董作宾诸氏可否各赠一部?”

通过上述确认可见, 郭沫若与中村不折的交集交涉几乎都是通过田中庆太郎进行, 其内容单纯集中。最多的, 是郭沫若从中村那里借用有关甲骨文、古文字以及书法方面的资料文献文物, 其次则是郭沫若向中村致谢, 寄赠文求堂出版的自己的著述。17 次交集中有 13 次发生于周作人访日之前。因此, 周作人来到日本后, 拜访郭沫若, 请他帮助斡旋面会中村不折事宜, 也就有了足够的根据。

那么, 下一个问题就是, 中村不折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为什么周作人在忙碌的访日日程中, 要花费周折去拜见中村不折。

中村不折的第一个身份是西洋画家。他是日本近代很早的画家之一, 辈分高资格老。论年纪, 他比田中庆太郎大 14 岁, 比郭沫若大 28 岁, 比周作人也要大 17 岁。中村 20 岁之后才开始正式学画, 师事小山正太郎, 攻水彩画、油画、素描等。35 岁时在巴黎万国博览会获奖, 第二年赴法国留学, 直到 40 岁归国, 之后声名愈振。但说到他在中国的影响, 说到周作人造访他的缘由, 主要并非在他作为西洋画家的一面, 而是他作为书法家, 特别是推崇和倡导六朝北派的书法家, 以及书法艺术品收藏家的不同凡响。中村曾写过一篇回想录《书道与画道》, 讲述了自己的书法人生: 中村 20 岁开始喜欢书法, 但当时一心想当画家, 书法只能偶尔抽空练习。1895 年“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爆发, 中村作为从军画家来到旅顺。一次, 有个日军士兵从一个名叫宋庆的清军将军那里拿到一本法帖, 并给了中村。中村开始研究这本法帖, 觉得十分有趣, 愈发热衷书法而不能自拔。再后来, 京都的文求堂迁到东京汤岛一丁目, 书店从中国输入了很多书法拓本, 中村被其中的《龙门二十品》¹¹深深吸引。当时中村画业繁忙, 渴望留学学画, 没有多少习字的余裕。即便如此, 不吸烟不喝酒的中村还是抓紧点滴时间习字。

当他终于实现留洋愿望奔赴法国时，特意带上一本《龙门二十品》和《孙家定谱》以及习字用具。留洋时代闲暇很多，中村依法帖和样本尽情习字，技艺大进。回国后，热情只增不减。他频频光顾文求堂，搜求书法珍品及法帖。中村参加了前辈们组织的“谈书会”，书法益进。在此过程中，中村了解感佩和崇敬中岳灵庙碑¹²，以之为典范确立了自己的书法方向——讲究中原古法、拘谨拙陋的北派书法。不久，中村以中岳灵庙碑法写出《龙眠帖》一卷，得到友人赞赏。1908年刊行后，意外获得好评，同好们以此为契机聚集起来，成立了同人组织，号称“龙眠会”，会员有五六百人之多，形成一个覆盖面广阔的书法热潮，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此后又相继成立了“健笔会”等团体。中村自己十分感慨：“我从一开始便以学习六朝的古拙为目的，我不太喜欢那种过于漂亮的字。这也是龙眠会的宗旨。但没想到却得到世间的热烈欢迎，形成了一股刻意追求古拙之风的倾向。之后，我便致力于进一步深化这种精神，使之发展为一种主义。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中村还有一个艺术信念，即“书画同源”。他说，“经汉、六朝之后，东洋绘画虽已脱离了象形，但还是具有象形和指事搭配组合的气质，反映了书画同源的渊源。”¹³

这样一个脉络，过去没有得到整理和辨识，故不能把握钱玄同、周作人与“中村不折笔”“魏晋大字”之间的诸种跨文化背景。现在的考察工作显示：周作人和钱玄同留学日本时期与中村的上述活动刚好交集重叠，从逻辑和情理上说，他们在东京留学时就完全有可能、也应该感受到“龙眠会”所掀起的流行热潮。当然，假设留学时代钱周二入碰巧真的没有理会到这个书法艺术的时代浪潮，没有关注到来自自己民族的书法艺术在日本的巨大回响，那也不要紧。因为中村及其

11 “龙门二十品”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二十方造像题记，是魏碑书法的代表。魏碑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兼有隶楷两体之神韵。

12 即北魏著名碑刻之一的《中岳嵩高灵庙碑》。中岳庙是嵩山道教最大的建筑，位于今河南登封县城东4公里太室山南麓黄盖峰下。相传碑刻立于北魏太安二年（456年），楷书，23行，行50字，寇谦之所书。康有为评此碑书为“体兼隶楷，笔互方圆。”其脱胎于魏晋隶书，故隶书森严；又为尚未成熟之楷书，故结体自由，用笔无拘无束。此碑以其独特的风格，为世人所重。

13 中村不折：「書道と画道」、『興亜書報』2卷1期21—22頁、1940年。

六朝体书法的“故事”之后仍在东亚继续蔓延发酵。

作为画家和书法家，留法回国后，中村不折很快便卓然成家，并全力以赴展开“书画同源”的实践，其绘画和书法创作探索开始传播到中国。中村不仅在油画和水彩画创作上每每取材中国古典和历史，其著名作品《华清池》《苏武之苦节》《醉李白》等，均可见中华文化的直接痕迹。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在周作人访日之前，中村的绘画作品已屡次被介绍到中国：

油画《华清池》（1926年北京《晨报副刊》1卷38号“星期画报”）

油画《山高月小》（1926年上海《紫罗兰》1卷13期）

油画《赚兰亭》（1929年上海《妇女杂志》15卷7期）

油画《文君当炉图》（1929年《北京画报》2卷51期）

油画《苏武牧羊》（1931年《北平晨报》“新年特刊”；1931年《北洋画报》12卷571-572期）

书画同进，中村不折在书法以及书法艺术品收藏方面的努力从未停止，其声誉和影响愈来愈大。自1908年刊行《龙眠帖》之后，他接连不断编辑出版了多种法帖，大力推奖和普及六朝书体：《兰亭叙》（1912）《赤壁赋》（1915）《楷书千字文》（1919）《草书千字文》（1919）《行书千字文》（1919）《文字八存》（1926）《禹域出土墨法源流考》（1927）《学书三诀》（1929）《法帖书论集》13卷（1933-1936，其中大半出版于周作人访日之前）等等。中村的书法艺术品收藏始于1914年由文求堂购入《草书经三卷》。此后，他继续通过文求堂搜购大量写经类古董，其中尤以王树枏（1851—1936，新疆布政使）旧藏的一批质量俱佳的收藏品最为珍贵。《禹域出土墨法源流考》及《法帖书论集》收录的均为中村个人搜集收藏的书法墨迹；平凡社出版的《书道全集》（27卷，1930-1932）收录的名品中，有关中国方面的大部分出自中村不折的收藏品。

书法创作及其推广普及、书法艺术品搜购收藏及其推广普及，在这两个方面中村不折贡献卓著，有些甚至超过书法的母国——中国，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以书法创作的知名度来说，比如，1929年，中华民国派遣日本实业考察委员张鹏

飞来访，拜托中村为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书写匾额，作为答谢赠送中村黎元洪手书条幅。中村最初委婉拒绝了这一请求，对方又拿来黎元洪手迹的照片：“书当洵义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此事相远每如此，抒怀百岁几回开。”后来得知，是中国方面有人看到中村为辽东新报社社长末永纯一郎题写的墓碑碑文，大为钦佩，于是有此动议。最后中村为之题写了“德配天地”的四字匾额。¹⁴

中村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历代文字书法文物和书法艺术品的收藏，数量巨大，珍品繁多。尽管中村为收藏公开这些文物艺术品投入了巨额资金，但他从未将这些视为仅属个人的资产宝物，从未秘不示人孤芳独赏。他的信念是“艺术不应为一己之私，而应广泛呈现于社会，并以此为喜悦。”因此他刊行了众多的文献资料集，将自己的收藏品制作成图版向学界和社会公开披露，提供大家共同研究的机会；他毫无保留的为有需要的研究者提供资料文物上的帮助和支援，所以才有郭沫若屡屡借用资料文物，屡屡致信感谢。正是出于这一信念和目的，中村自1933年开始以一己之力着手建造书道博物馆——“财团法人书道博物馆”，并于1936年11月竣工开馆。此次调查发现了当时中国方面的报道《日本成立书道博物馆》，全文如下：

东京最近成立一专门博，为中村不折氏独立创办之书道博物馆，据中村氏称三十年前赴欧研究画法，深感其本国各种专门博物馆之缺乏。故于今秋成立此馆。馆设于下谷区上根岸一二五号，除星期外，每日开馆。按中村氏为日本书法大家，尤富收藏。改馆陈列品，即以其藏品为基本。有法帖五千件，古钱五千件，其他金石一万三千余件。其中有殷墟出土之甲骨文字，西汉有文字之陶器，三体石经残石，唐人写经等品（陵）¹⁵

至此，可以肯定的说，鉴于中村身为通今博古学贯东西、纵横绘画界书法界

14 中原光：『中村不折 その人と芸積』210頁、東京：講談社、1973年。

15 《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第2卷第1期，1936年。

艺术界的日本先辈大画家大书法家大收藏家，又曾经在中国大众新闻媒体屡屡登场、与中国文化艺术诸多关联，因此象周作人、钱玄同这样与中村趣味相近、又有多年留日经历的“同道”，应该知晓了解中村不折，或心怀仰慕敬佩之心。于是无论如何，也要与之相见相识；于是，既无面识，总须有联结的管道。这便有了郭沫若的登场，而郭沫若的背后又是最关键的田中庆太郎。

四、周作人与郭沫若及中村不折的会面

所幸，前述日记和书简资料记录清楚具体，周作人与郭沫若会面、进而与中村不折会面的过程也很容易再现出来。

7月30日：郭沫若前来拜访周作人。“郭沫若君同其四女来访耀辰，共谈良久而去。”（《周作人日记》下册第654页，大象出版社，1996）

评述：“共谈良久而去”，传递出和谐沉静之气氛。昔日同为新文学新文化干将，虽有过芥蒂乃至齟齬，但异国相逢，况郭沫若正处流亡的艰难时期，同胞相会惺惺相惜之情跃然。

8月14日：（1）周作人往市川，拜访郭沫若宅。“乘电车至市川须和田二六七，访郭沫若君。下午回寓，已四时。”（《周作人日记》下册662页）（2）14日同日，郭沫若致信田中庆太郎，称周作人希望面会田中庆太郎及中村不折，详见《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299页。

径启者，今日周作人、徐祖正两先生来访，谈及尊处，颇愿识荆，嘱为介绍。拟于十七日午前奉访，并欲瞻仰观潮楼，不识尊便如何。又两君欲访中村不折翁，兄台如能介绍，尤所至禱。周、徐二君现寓本乡菊坂町八十二，菊富士ホテル。/ 赐复如径交彼处，实叨德便。/ 子祥尊兄 / 沫若 八月十四日

评述：此处周作人之行动，足见其自律礼仪和严谨。前日既有郭沫若来访，

且“共谈良久”，按说周作人直言托请郭沫若有关田中、中村事宜亦无不可。但周作人采取完全不同做法：另外择日专程上门拜访郭沫若，既是回访，更以登门拜托表示郑重。

8月17日：周作人与郭沫若拜访田中庆太郎宅。“上午同耀辰往文求堂访田中君，未几郭沫若君亦来，同往千駄木町田中宅，即旧森氏观潮楼也。午在大学前鉢の木洋食。田中氏夫妇为主人。下午一时半回寓。”（《周作人日记》下册663页）

翌日，郭沫若致信田中庆太郎，表示感谢。见《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166页。“昨日偕周、徐二君奉访，多蒙慰意招待，归时更蒙嫂夫人送至御茶水，感激感激。（中略）专此鸣谢，即颂 / 暑安”。

不仅如此，8月24日，郭沫若又用日语写了明信片，再次向田中表达谢意。“（前略）沫若 八月二十四日 / 周徐両氏に色々御盡力して下され、御禮申し上げます”（周徐两先生蒙您诸多关照，谨致谢意。）

评述：郭沫若两次致谢田中庆太郎，一者周作人往文求堂访田中不遇，遂与郭沫若往田中居所，田中倾心接待，时田中居住于租借的森鸥外旧居“观潮楼”，固有周作人希望参观之请求；田中带客人参观，并招待西餐午饭。二者，郭沫若平日诸事多得田中关照扶助，此次以他人之事相托，倍加感激。

8月18日：周作人往文求堂，约定拜会中村不折事宜。“上午田中君来访，即同往文求堂，约二十日下午往访中村不折君。”（《周作人日记》下册664页）

评述：应是田中往周作人下榻酒店访问，后两人同往文求堂，商定拜访中村事宜。

8月20日：周作人访问中村不折宅。“下午三时田中君来，与耀辰同至上根岸一二五访中村不折君，观所收藏，以所印汉魏写经一帖见赠。五时归。（中略）

汉魏写经影本 中村君赠。”（《周作人日记》下册 664-665 页）

评述：田中来酒店，携周作人、徐祖正往中村自宅拜访。参观其收藏品，并获赠所刊行之汉魏写经。

9月5日：钱玄同拜访回到北京的周作人。“玄同来谈，赠账笔一支，十时半去。”（《周作人日记》下册 672 页）“晚访启明，他是二号回平也，他在东京访过中村不折及郭鼎堂也，晚十时半归。”（《钱玄同日记》下第 1036 页）

评述：周作人回国两日后钱玄同前往看望，特意记曰“他在东京访过中村不折及郭鼎堂也”。可推测两人会谈到许多话题，但特意记入日记，足见此事乃两人共同关心之重要话题，与之前的中村笔、魏晋大字等处于同一脉络。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三个会面——郭沫若 / 周作人 → 周作人 / 郭沫若 → 周作人 / 田中庆太郎 → 田中庆太郎 / 周作人 / 中村不折。7月30日，郭沫若拜访周作人；8月14日，周作人亲往市川，回访郭沫若并托请郭沫若介绍田中庆太郎及中村不折；郭沫若随即致信田中庆太郎，说明原委；之后，陪同周作人拜访田中；后日，周作人田中会面约定拜访中村不折；两日后，顺利访问中村。

结语

正如旅日学者刘岸伟所说，长达两个月的“周作人访日受到各方面关注”。周作人走访了“日华学会、外务省、东方文化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会”，“多次接受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中央公论社、改造社等新闻媒体的采访。”¹⁶有趣的是，当周作人结束访日回到北京，钱玄同来看望他，两人久别重叙，直到夜里十点半。而两人谈论的话题，被钱玄同郑重记入日记的，不是佐藤春夫、岛崎藤村这些日本文豪，而是周作人与中村不折及郭沫若的会面，足见此事对他们两人来说意义

16 劉岸偉『周作人伝：ある知日派文人の精神史』（ミネルヴァ書房，2011）第212-213頁。

不同寻常。换言之，周作人顺利会面中村不折，必定是实现了他以及钱玄同的一个夙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是成就此次会面的功劳者，期间周郭的几次接触想必也是彼此诚挚相待，于是才有周作人日记中的“共谈良久”“下午回寓，已四时”。而回国后听过周作人长谈的钱玄同特意在日记中写到郭沫若，对其古文字学造诣给予很高评价，1930年11月9日日记：“近来每于晚间卧榻上看郭氏书，觉其见识实超卓，治甲、金文字当以此为正路。我之目的虽与彼不同，彼重历史，我看文字，但治文字，亦非具此眼光不可也。”（《钱玄同日记》中第772页）周作人虽无正面评述，但想来钱玄同所感或许与周作人有关，而以访日期间周与郭的过从来看，应与钱玄同在同一路径上。

总之，1934年夏季周作人与郭沫若会面，以及周作人结识田中庆太郎、访问中村不折的背后，存在着以书法、艺术、学术为纽带的人际联系，存在着近现代中日文化、文化人广泛悠久的交流交集的事实，而这一事实的发生和持续，更通向古老辽远但从未断绝的历史脉络；郭沫若与田中及中村，钱玄同周作人与田中及中村，他们彼此交错交织的连接以及相互敬意，都内在的与辽远的文化和历史处于同一结构，并超越了诸种现实矛盾、以及国家支配体系和政治形态的羁绊，完成了基于质朴人性和纯粹艺术情感的协作互动。1934年夏天的这一系列来来往往，再次昭明，无论情态如何险恶，所有人性心中总会有一块为人者共同享有的美好空间。

而在这一系列人际互动、也是文化情感的互动中，周作人所呈现出来知性趣味之旺盛之宽广，以及为人处世的自律方正和严谨，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追记：

本文系在潘世圣、中里见敬《周作人钱玄同俞平伯诗作书札——兼及钱玄同书札所见中日书法文化交流》（“首届周作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基础资料的钩沈与整理”，早稻田大学，2018年7月8日），及中里见敬《一九三四年夏、周作人

・郭沫若面会の背景：「錢玄同致周作人書簡」を手掛かりとして》（《郭沫若研究会報》第 20 号，2018 年 12 月）两文基础上进行全面增补修订而成。特此说明。